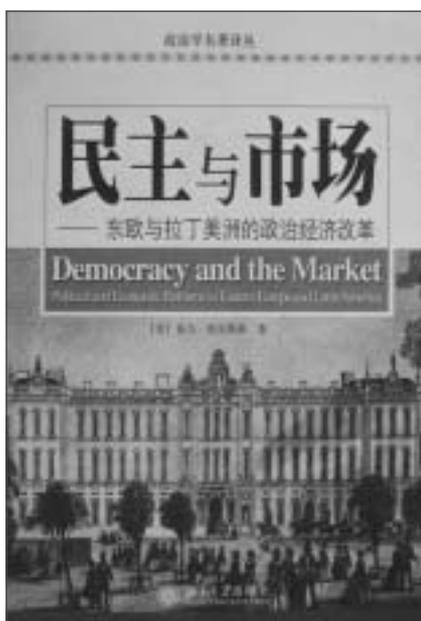


政治經濟體制轉型之難

● 李國強



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著，包雅鈞等譯：《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在政治學領域中，政治發展研究從來都是引人矚目的熱點。在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政治變遷等理論風潮過後，二十世紀末該領域又興起了政治轉型研究。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的名著《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

濟改革》(*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and Latin America*)，以下簡稱《民主與市場》，就是轉型研究的經典之作。

一 行為者vs.結構

社會科學研究經常面臨一個解釋上的難題，就是在探究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時，到底是行為者的能動性重要，還是政治與社會中的宏觀結構更有限制性。對「行為者—結構」(Agent-Structure) 的不同看法，往往導致迥異的研究路徑。

在政治發展研究中，大多數學者都注重宏觀歷史比較，強調政治與經濟結構的決定性作用。李普塞特 (Seymour M. Lipset) 在其名著《政治人》(*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一書中認為，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是由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民主化與社會富裕程度呈正相關關係 (李普塞特著，張紹宗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摩爾 (Barrington Moore) 曾區分出民主、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等三條

在政治發展研究中，大多數學者都注重宏觀歷史比較，強調政治與經濟結構的決定性作用。如李普塞特認為，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是由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民主化與社會富裕程度呈正相關關係。

在新一代政治轉型研究中，宏觀歷史決定論受到普遍質疑。如果社會經濟結構早已決定一切，那麼行動者們就只能無所作為了。其實，在轉型過程中，政治行為者的策略選擇和行動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政治發展道路，指出這三種道路分別根源於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背景下階級關係組合模式的變異和轉換（摩爾著，拓夫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中認為，現代社會革命非任何社會群體所能主導，革命形勢是由既有社會經濟和國際條件決定的（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在新一代政治轉型研究中，這種宏觀歷史決定論受到普遍質疑。如果社會經濟結構早已決定一切，那麼行動者們就只能無所為為了。毫無疑問，權威政治下的制度規範、變遷時的政治秩序、政治領導和判斷、特定行為者的角色、時機、互動策略選擇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在塑造着轉型過程。其中，政治行為者的策略選擇和行動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洛文索（Abraham F. Lowenthal）、奧唐納（Guillermo O'Donnell）、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等人都認為，在轉型研究中，應當集中研究不同行為者的政治資源和互動策略，因為過渡時的狀況最終決定着新政權的特徵（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5-7）。普沃斯基則指出，儘管新政權的特徵未必會受到過渡時期路徑依賴情形的「鎖定」（Lock-in），但對參與者互動

策略的分析，的確應當是轉型研究的重中之重。

由於互動過程中充滿政治和經濟衝突，所以普沃斯基在《民主與市場》一書中，大量採用理性選擇和博弈論的方法進行分析。例如在論述民主本質時，普沃斯基就援引賴克（William H. Riker）的論證及「阿羅不可能定理」，指出從邏輯上講並不存在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即使存在也無法通過民主程序兌現出來。在論證民主形成的三種策略情形時，他引用了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等理論來進行分析，並根據博弈論的思想，證明了唯有參與者眾多且分散、而且出於自身利益而聯合懲罰不合作者時，民主合作機制才能夠形成。

二 民主與民主化

普沃斯基認為，所謂民主，就是各種政治力量集體性地組織起來，在制度框架內為自身的利益而相互競爭，民主的結果由資源與制度共同決定。民主博弈的參與各方擁有不同的經濟、組織、意識形態等政治資源，但都力圖整合所屬群體的利益，並為了實現該利益而採取相應的策略。民主是一種處理衝突的制度，是一種分散的決策體制。任何政治力量事先都無法知道衝突結果，因為其行動在影響其他行動者的同時，也受到其他行動者的影響，因此，民主天然蘊涵着不確定性。

就此而言，民主化就是把所有社會利益都付諸競爭、把不確定性

制度化的過程。要把利益競爭制度化，民主制度應當為競爭中的失敗者提供長期上的勝算，否則就會產生不服從。從靜態上看，民主必須是公平的，以便相關政治力量在利益與價值競爭中都有獲勝的機會；從動態上看，民主必須是有效的，以便使民主下的失敗也比非民主的未來前景更具吸引力。因此，在民主制度設計上應遵循兩條原則：首先，政府必須足夠弱，對政治利益和力量的變化保持敏感，在政治上有所順應；其次，政府必須足夠強，以使任何一方都不能單方阻礙政策的制訂與執行。

普沃斯基認為，民主化是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首先，權威主義政權崩潰的過程充滿變數；其次，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具備多種條件，而權威主義政權崩潰只是必要條件，並不是充分條件。在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各方力量的合縱連橫決定着最終的結果。為了實現民主，各種民主力量必須團結起來與專制政權鬥爭，同時也必須為了爭取民主之下更好的未來而相互競爭。

政治轉型始於公民社會的興起。由於經濟或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權威主義政府逐漸開始放鬆管制，這就是所謂的自由化過程。自由化帶來的重大政治後果，即政治力量之間的分化組合。政府內部分裂為兩派：改革派主張繼續放鬆管制，開放政治空間；而強硬派則主張停下腳步，盡快回轉到改革前的狀態。此時公民社會由於自由化而勃興，內部也大致分裂為兩派：溫和派主張與權威政權作適當妥協，推動和平交接；激進派則反對妥協，主張立即發動革命以摧毀舊

政權。普沃斯基通過博弈論證明，唯有改革派與溫和派結盟，且改革派能夠控制強硬派，溫和派能夠抑制激進派時，才能和平而又迅速地擺脫舊政權。任何其他策略組合，都會導致轉型失敗。

擺脫舊政權後，緊接着的問題就是設計和建立民主制度。由於制度決定着未來的利益分配，因此各政治力量之間會展開競爭，爭取構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這裏有三種情況：1、力量已知且不平衡；2、力量已知且平衡；3、力量未知。在第一種情形下，新制度極有可能是為強勢者量身訂做的，這不但有違民主原則，而且一旦力量結構在未來發生變動，新制度就會轟然倒塌。在第二種情形下，表面上看可能實現均衡合作，實則不然。由於各方力量的內在偏好不同，難以就制度設計達成一致共識，其後果可能是長期內戰，十九世紀的阿根廷就是明證。第三種情況類似羅爾斯(John Rawls)所說的「無知之幕」，各方都不知道現有的力量結構，其最優策略都是在實現民主的同時制衡強勢集團，此時設計的制度才最符合民主要求，也最穩定長久。

民主和民主化過程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即便實現了轉型，民主的鞏固也取決於其在經濟上的成就，因為更大的難題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從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

三 市場與市場化

一個良好的經濟系統應當利用極少的自然資源和人力成本創造盡

普沃斯基認為，民主化是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首先，權威主義政權崩潰的過程充滿變數；其次，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具備多種條件，而權威主義政權崩潰並不是充分條件。為了實現民主，各種民主力量必須團結起來與專制政權鬥爭，同時也相互競爭。

純粹的市場經濟是不合理的，因為它不能實現技術上可行的福利分配機制；純粹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大規模集中分配實際上是不可行的。現實中比較可行的是兩種混合經濟，即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應當是經濟轉型的目標。

可能多的財富，同時要向每一個人提供最起碼的物質福利。純粹的市場經濟是不合理的，因為它不能實現技術上可行的福利分配機制，弱勢者無法維持最低水準的生活。純粹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大規模集中分配實際上是不可行的，而且無法激勵理性個體去增進集體利益。現實中比較可行的是兩種混合經濟，即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應當是經濟轉型的目標。

經濟轉軌首先意味着經濟自由化。世界上有多種操作方案，但大致跳不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範圍，即放開價格、引入市場競爭、放開產權交易、調整經濟結構等。在極短時間內把「華盛頓共識」的藥方付諸實施，就是通常所謂的震蕩療法或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從市場經濟角度看，計劃經濟下存在着嚴重的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而且由於計劃控制所固有的缺陷，造成普遍的物資短缺，所以是一種短缺經濟。把一個根本上不適應市場的經濟系統拋入市場漩渦中，經濟效率必然會暫時下降，這意味着必須付出巨大代價，之後才會出現經濟復蘇，普沃斯基把該時期形象地稱為「轉型之谷」(Valley of Transition)。

經濟轉型會帶來總體性影響，也會帶來分配上的影響。總體性影響包括通貨膨脹、失業、資本閒置、暫時性資源配置失誤等。原有計劃經濟導致的結構性短缺、經濟壟斷、政府赤字等都可能引發通貨膨脹，這裏關鍵的因素在於轉型期國家能力普遍弱化，無法抑制壟斷，也無法實施有效的徵稅以彌補

赤字。由於經濟自由化降低對企業的保護、引入競爭、工資壓力以及原有國企的「消腫」，原有不恰當配置的人力和物力都會受到考驗，大面積失業和資本閒置變得不可避免。經濟轉型還影響財富分配，無專業技術的官員、工人等，都很容易陷入赤貧狀態。經濟代價影響着政治行為，如果經濟轉型不成功，勢必會瓦解民主體制的根基。

普沃斯基根據「轉型之谷」的背景，建立了一個經濟改革的政治動力學模型。該模型包括三個備選方案(即激進改革、漸進改革和保持原狀)和三類行動者(即技術官僚、當政的政治家和民眾)。人民要吃飯，技術官僚(普沃斯基在此指的是設計改革路徑的經濟專家)要成功，政治家要民眾的支持。經濟專家們往往只注意到陣痛之後的經濟均衡而不關注社會代價，因此比較偏愛激進改革。政治家們急於與權威主義體制決裂，因此也傾向於激進改革。民眾開始時支持激進改革，但隨着社會代價出現，這種支持常常會迅速消失。

通過該模型，普沃斯基證明了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並不是社會代價最小的策略，最可能出現的改革路徑是先發動激進改革，在此過程中公眾信心急劇下降，於是改革會放慢速度或開倒車。民眾開始厭煩，選舉新一屆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後宣布再一次改革，於是循環又開始……因此，轉型國家最有可能的經濟改革路線就是走走停停的「之」字型路線。

為了推進改革，政府必須尋求反對黨、群眾組織的支持，或者盡量削弱之，使其無法妨礙改革。很

多時候，政府在無可奈何之下可能採取權威主義方式推動改革，從而破壞民主制度；而一旦民主被削弱，實施改革就很有可能導致政治動蕩。

四 評論與批評

普沃斯基沿着時間軸線，把轉型過程分為民主化和市場化兩大階段，在理論上既有所區分，又相互關聯，並據此對政治經濟交織的複雜局面進行了細緻分析，可見他對民主與市場的認識是富有洞察力的。但《民主與市場》一書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首先是從反對結構決定論滑向結構虛無論；其次是只分析了東歐或拉美的激進轉型，忽視漸進轉型國家。這就使其分析架構存在漏洞。

結構決定論忽視行為者的積極性，過份誇大政治、經濟、歷史等結構性因素的作用，誠然是不可取的，但是社會科學中絕對無法否認結構約束着行為者的選擇。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就曾指出，政治領袖必須去造就民主，必須採取行動，但是「政治領袖不能在民主的先決條件不存在的地方通過其意志和技巧去創造民主」(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120)。舉例而言，不考慮經濟增長、中產階級的壯大，乃至梵蒂岡對待權威主義政權的態度，就無法理解拉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考慮國內經濟停滯、國際環境變化，就無法理解蘇聯、東歐的劇變。《民主與市場》

一書忽視了很多結構性因素，僅僅看到兩處結構性因素，一是國家與社會中政治力量格局的變化；二是經濟轉型必然要經過「轉型之谷」。這固然與作者的分析框架有關，但畢竟有損分析效果。

此外還存在另一個問題，普沃斯基分析的都是激進轉型國家，沒有漸進轉型國家的例子。如此一來，其理論視野就受到了局限，比較典型的就對經濟轉型代價的分析。普沃斯基認為，經濟轉型必然要遭遇「轉型之谷」，「轉型之谷」帶來的陣痛又會影響民眾對民主政權的信心。事實上，關於如何平穩逾越「轉型之谷」的問題，漸進改革國家已經給出了答案。中國經濟學者樊綱認為，轉型總會改變現有利益關係，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損，因而出現「非帕累托改變」(non-Paretian change)。更重要的是，改革收益相對於改革成本是滯後的，即便改革的預期結果是「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改革過程中的陣痛仍然會損害很多人的利益，摧毀他們對改革的信心。因此，漸進改革的關鍵就是使改革收益與改革成本「同步化」，把預期中的收益拿到現在補償損失，即「向未來借錢」。但是很顯然，不可能向未來借錢，因此必須把問題轉化為「向別人借錢」。

提到「向別人借錢」，很多人立刻想到借外債。普沃斯基也認為，外債在經濟轉型中發揮着重大作用，如東歐、拉美的經濟轉型都是在外部大規模金融援助下實現的。但是，小國可以寄望於貸款和外援，對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而言，再多的外部援助也是杯水車

普沃斯基認為最可能出現的改革路徑是先發動激進改革，當公眾信心急劇下降時，改革會放慢速度或開倒車。民眾開始厭煩，選舉新一屆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後宣布再一次改革，於是循環又開始。

外債在經濟轉型中發揮着重大作用，如東歐、拉美的經濟轉型都是在外部大規模金融援助下實現的。但是，對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而言，再多的外部援助也是杯水車薪。

薪。因此，更有效的手段應當是「國內外援」，而這正是普沃斯基忽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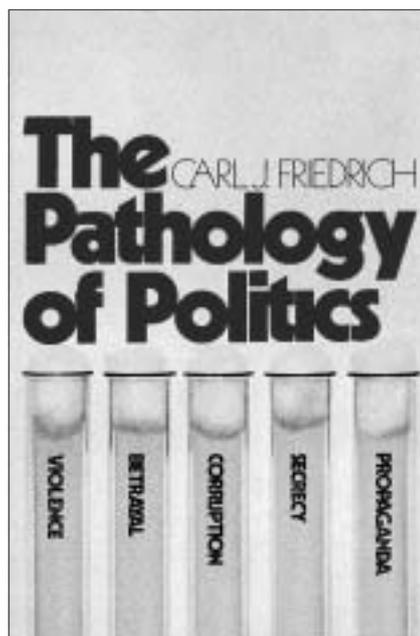
一般看來，需要改革的經濟體內部，是無法自我補償的，但是如果需要在需要改革的舊經濟之外，發展一部分富有活力的新經濟，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特點就是增量改革，「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能夠使效率較高的新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一旁逐步發育、成長起來，就可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多種經濟成分發展起來之後，居民就業渠道和收入渠道增多，就業結構和收入發生變化，從其他渠道獲得的收入補償了改革的成本。同時，新經濟的示範效應也使人們逐步適應新環境，從而避免過渡時期

的混亂。這樣既給經濟改革爭取了時間，避免了嚴重震蕩，又穩健地發展了市場經濟(樊綱：〈論改革過程〉，載盛洪主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36-64)。

《民主與市場》一書儘管在研究視角上還存在一些偏頗，但仍不失為一本轉型研究的傑作。普沃斯基開闢了轉型研究的新路，他提醒我們關注轉型過程中的行動者因素；他對轉型過程的追蹤分析，顯示了新的政治學分析工具的威力。在國內很多學者依然固守李普塞特、亨廷頓、阿普特(David Apter)、白魯恂(Lucian W. Pye)、林茲(Juan Linz)等傳統研究者的理論時，借鑒一下普沃斯基的研究將是很有意義的。

腐敗及其四個親密夥伴

• 孫傳釗



Carl J. Friedrich, *The Pathology of Politics: Violence, Betrayal, Corruption, Secrecy,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為甚麼讀經典》(*Perché leggere i classici*)中，曾這麼說：「一部經典作品不一定教導我們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有時我們在一部經典作品中發現我們已經知道或總以為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卻沒有料到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是那個經典文本首先說出